

中国

不能

永远为世界打工

薛涌◎著

指引工业革命4.0背景下的
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

工匠精神与社会、商业、人类思维的深刻巨变
新时期升级实体产业技能、融合世界商业变化的指导用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

不能

永远为世界打工

薛涌◎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模式为主线,结合世界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发展问题,分析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作者敏锐捕捉时事热点,以朴素、直白的语言作出分析,以不一样的视角,对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同时把对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发展的观察研究,以及留美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融入本书。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 薛涌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02-43888-5

I. ①中…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0280号

责任编辑:杨静华

封面设计:刘超

版式设计:刘艳庆

责任校对:刘同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9mm×230mm 印 张:14 字 数:205千字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6.00元

产品编号:067948-01

前言

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如今，“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主题话语。这一高度前瞻性的讨论着眼于世界历史上崛起大国与传统大国不断冲突的事实，试图探索一条避免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相冲突的崛起之道，无疑对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是，“和平崛起”的讨论，如果建立在“只要和平，必定崛起”的预设上，就会把中国的崛起简单地化为一个外在环境的问题。其实，制约中国崛起的内在因素更为复杂。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 30 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显得力所不及。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反之，如果中国的大部分人口能够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生活水平能有实质性的提高，他们的劳动力就不再如此便宜。一个穷国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就像是在跑

一场马拉松。如果只顾眼前的路程，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蓄力，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

那么，中国的后半程战略是什么？

一般来说，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为前提。相反，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久前，笔者向一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国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知名经济学家提出，目前中国对劳工的利益缺乏保护，劳动力价格低得不正常。他听后一摆手：“你不要老听美国报纸上的宣传，我是相信自由市场的。只要活儿有人愿意干，就无所谓工资低的问题。他们竞争不过，就抱怨我们劳动力价格低。你看看美国，劳动力这么贵，根本没有竞争力！”

其实，笔者也并非不相信“自由市场”。问题是，中国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现实，不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市场不自由的结果。比如，拖欠民工工资的新闻不绝于耳。这些“不自由”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劳动力的价格。

这位经济学家代表了国内普遍性的想法：劳动力价格低企业才有赚头儿，才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经济起步之时，应该多积累、少消费，企业以创造利润为主，国家不要干预企业的行为。

吃够了计划经济之苦的经济学家，知道应该限制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行为，却不懂得也应该限制企业在经济领域的行为。计划经济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剥夺了社会集团和个人的自由，将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上，计划管理；另一种是企业不正当地从自己员工身上榨取高额的剩余价值，把本来应该分散在个人手上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统一管理。经济学家们的误区是：他们反对以国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但并不反对以企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

事实上，美国的劳动力价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用自由派的名言来说，“小的是美好的”，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

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比起国家和企业来，个人最懂得如何运用手里的经济资源。把本属于个人的经济资源转移、集中到企业，其实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最终将给我们带来灾难。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二是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反观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悬殊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动力不足，所以发展的脚步一直赶不上中国。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力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其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因此，一个均富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中国大国战略的基石。

目 录

第一章 实业兴国：体制 实干 探究	1
人重物轻，大国崛起	2
“世界工厂”的转移	12
“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	19
大国经济的博弈	22
发现欧洲	25
印度的挑战	27
印度的世纪正在到来	29
日本会不会堵住东亚的发展之路？	31
韩国：东亚模式的新起点	32
两种计划经济	36
第二章 创新立业：务实 科学 求富	47
大国小业	48
全球化的第二波——中国面临的危机与回应	51
知识产权不仅仅是履行国际义务	54
悬磁“悬”在什么上——以市场规模换先进技术的大国经济博弈	55
风力发电：未来能源战略的核心	59
中国的鲁班哪里去了？	61

自行车的权利有了，产品在哪里？	63
登月启示录	65
第三章 人文树德：立道 立德 立言	67
中国的人口危机和对策	68
欠薪是个发展问题	117
中国闹人荒！——精英白领危机对我们未来的威胁	119
富人论	124
经济学家的“大跃进”心态	128
贸易壁垒之后的价值壁垒	130
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人——市场经济的再诠释	132
第四章 大道行思：激情 危机 沉淀	135
大国经济	136
我们能不能住小房	174
中国需要“环境民主”	176
保护“中国”品牌	178
正视“中国制造”的信誉危机	180
第二次“农业革命”的来临	182
粮食进口的“市场依赖”与“生存依赖”	184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谁？	188
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191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197
经济转型中的城市战略	200
城市：自治与信赖	204
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207
何时是世界经济的下一个大萧条？	209
创造中国的生活方式	212

第一章 实业兴国：体制 实干 探究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

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大国，就要首先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

人重物轻，大国崛起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这种似乎是永远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被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纵观现代史上的大国崛起，靠廉价劳动力是无法维持大国地位的。中国真正的崛起，必须依靠建立在优质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昂贵劳动力。对此，那些高唱“衬衫经济学”赞歌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不能理解，甚至无法想象，这就需要对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从宏观历史的角度作一番考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工资不仅刺激国富增长，而且也是国富增长的自然症候。高工资并不决定国富的总量，而决定国富的增长速度。例如，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工资水平高于英国，最有发展的前景；英国是欧洲工资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增长也相当强劲；中国则是到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下层百姓生活并不富足。

需要注意的是，在亚当·斯密发表上述这番见解时，英国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美国还不存在，那十三个偏僻的殖民地即使在美洲也不是经济的中心（当时美洲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使用奴隶的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那个时候，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乃至乾隆在大约二十年后还能通过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通话英王：“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然而，没过多久，亚当·斯密的预言全部实现：英国崛起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美国则来势更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而代之；最富有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凌辱，沦为世界的弱国。这样的历史教训，足以让今日的中国警醒。也许，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穷、大国小民的状况，亚当·斯密二百多年前的预言对今日的中国将同样适用。

英美为什么能主宰世界？

现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两强主宰。自18世纪中期“七年战争”后，英国就成为一个世界强权国家，到了19世纪初拿破仑战败后，英国便奠定了其“日不落”帝国之地位。美国则在19世纪末开始取而代之，自20世纪起主宰了世界。在这期间，虽然两国不断受到来自德国、日本、苏联等新兴力量的挑战，但仍能维持长盛不衰。乃至有人称现代世界实际上是被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所主宰。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力量由哪里来？正在寻求大国地位的中国对此不可不查。

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出版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Robert Alle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对西方几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对工业革命的传统解释，多集中于供应一端，即技术的发明创造，如珍妮纺纱机、蒸汽机、铁路的诞生等，或工厂新型企业组织的形成，正是这些技术和组织的突破把世界经济带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但是，这套学说到了20世纪就越来越受到质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学者把目光拓展到了需求的层面上。他们发现，促发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因素，在欧洲大陆基本都有。如荷兰、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科学水平，足以把世界带进蒸汽机时代。可惜，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些地区因为不具备市场潜力而没有被开发。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

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出利润的市场。

那么，这一市场从哪里来？简单地说，就是“人重物轻”。在18世纪，英国是欧洲劳动力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荷兰），逼得雇主挖空心思节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机器生产的模式。而机器生产需要的投资规模之大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在劳动力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用机器替换劳动力才是理性的投资。在欧洲大陆，大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与其购买昂贵的机器，还不如使用廉价的人力。最富裕的是几个小国，如尼德兰（即荷兰）和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国家，本身不具备吸收机器生产量的市场规模。所以，欧陆国家即使有工业技术也不会采用。另外，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煤炭来驱动。英国则正好蕴藏着大量的煤炭。特别是美洲的开发，使英国额外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这些因素相加，使原材料和燃料价格特别便宜，大大降低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成本。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亚当·斯密指出，18世纪中叶美洲英属殖民地的劳动力比英国还昂贵。纽约州的工价比伦敦还高。同时，美洲殖民地资源更丰富，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更便宜，如弗吉尼亚州有著名的“五十英亩规则”。为了吸引稀缺的劳动力，每个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亚的海岸，就可以自动获得五十英亩的土地（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足球场为两英亩左右）。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特别是后来的美国，用机器代替人力就更为迫切、更有利润。事实上，美国在19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开拓了巨大的市场。许多英国发明的技术，因为在本国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首先得以应用。世界工业的中心也就从“人重物轻”的英国转移到人更“重”物更“轻”的美国。

人之轻重：东欧西欧的历史分水岭

这一历史现象，对中国崛起的大国战略非常有帮助，同时也给当今的中国以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虽然经了30年奇迹般的经济腾飞，但是中国的现状

不是“人重物轻”，而是“人轻物重”。中国的经济，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衬衫经济”。《经济学人》几年前曾报道，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一些外商到中国设厂后，宁愿放弃已经使用多年的技术。因为即使是二流的设备，也比中国的劳动力要贵得多，用贵机器替换贱人力不合算，进而形成了“低薪陷阱”“低技术陷阱”。这和英美工业化的模式几乎背道而驰。另外，虽然中国的能源、资源匮乏，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却又属于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十分依赖大量的石油和原材料进口。中国的经济越是崛起，对这种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也就使之变得越紧缺、越昂贵。到2008年为止的石油、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屏障。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战略性的更新，这种屏障随着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恢复则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

怎么才能摆脱这种“人轻物重”的困局？我们仍要参照西方的经验。固然，中西的历史和社会境况非常不同，不能简单地互相照搬。但是，工业革命毕竟缘于西方，现代世界的经济秩序还是建立在西方体制之上。从西方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应该明白“人重物轻”的优势是如何形成的。这会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先说“人重”。如今欧洲史学家们的一个主流意见是，东西欧从中世纪起分为落后和先进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轻重。14世纪中期黑死病肆虐全欧，使欧洲人口至少减半，土地荒芜，经济萧条。这对中世纪的封建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胀导致人力贬值，土地紧缺，粮价上涨。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在经济上自然强势。但是，人口减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大量的荒地，使农民和农奴不再需要依附领主，可以找块地方自立。劳工因为稀缺，其价格比黑死病发生前高出3倍，靠卖力气吃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增长，岂愿轻易屈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来越难。

面临这样的挑战，东西欧的封建势力有两种回应方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后果。在东欧，国王的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地方的贵族势力把持一切。他们利用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面对减少的人口强化封建人身控制，把农

奴拴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准他们利用新的经济现实讨价还价。西欧特别是英格兰情况则复杂得多。在这里，国王和贵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谁也无法垄断政治权力。封建领主和农民发生冲突时，农民经常跑到国王法庭上诉讼，国王也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而英格兰基层社会丰富的自治传统对普通百姓多有庇护。比如，即使是农奴在与领主发生纠纷并在领主法庭受审时，也享受着初期陪审制度的保护。农奴如果找出几个同伴证明自己无罪，领主经常告不倒他。所以，尽管英格兰的领主们面对危机也希望使用政治权力加强对农奴的封建控制，可惜农奴和农民在社会中有种种制度资源可利用，在关键时刻坚决反抗，使领主无法得手。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场规则上来。比如领主降低地租，特别是通过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农民，以吸引人力资源维持自己庄园的生产。要知道，黑死病使人贵地贱，粮食也便宜，领主只要能从佃户那里收一点租，就不在乎转让大片土地的使用权，这样总比听任土地荒芜要好得多。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农民手中低价转让而来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拿着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强化，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的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可以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相提并论。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即使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缴纳的地租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价，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17和18世纪的工价最高。

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

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靠市场、靠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价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小民百姓则完全没有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被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就要首先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其实同当年东欧的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线，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的，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道：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则改

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的讨价还价，工人们即使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上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上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证明。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作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吗？雇佣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佣着一群月薪八百块人民币、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的态度当然大有不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机遇

不过，中国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历史机遇，可以把“人轻”的劣势翻转过来。这一机会，就是即将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和黑死病有着相当类似的功能。在老龄化中，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这将使劳工在市场上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砝码。问题是，面对他们在市场上的要价，政府是应该支持、保护他们的权利，还是抑制他们的权利？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是支持和保障劳工的权利，抑制亚当·斯密所分析的资方在博弈中的资本优势，使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对均衡，增强市场交易的效率。当资本不可能通过乘人之危地压低工价而升值时，就必须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加大投入。有些经济学家称，最低工资的立法会降低就业率。这个问题至今越来越有争议。其实，即使真是降低了某一部门的就业率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最低工资逼着老板裁员，他就必须通过优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来补偿人员的不足。当美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时，一位坚持雇佣刑满释放人员、并支付慷慨的工资的老板就说：“如果你的买卖仅因为最低工资提高那么几毛钱就会垮掉，那说明你的创意太少、太缺乏竞争力了！你带给社会的新东西这么少，社会凭什么回报你呢？你早该倒闭，让我们这样的企业来替代！”

中国也应该如此。如果不能给工人支付千元以上工资的企业，那么在当

今的经济水平上根本就不应该有生存资格。可惜，“改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基因，它们总是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方一边。这样就抑制了“人的崛起”，从长远看也抑制了“中国的崛起”。如果我们用中世纪英格兰的例子做一个比喻的话，当时的英王主导中央政府，贵族主导地方权力。当贵族和农民发生纠纷后，国王法庭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这就使中央政府在老百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英国王室不仅存活到今天，而且仍然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这和历代国王法庭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有集权主义的传统，所有地方官都是中央任命，因而中央也经常感到有责任捍卫地方官的权威。其实，这等于代人受过，削弱自己的合法性。那些地方官经常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甚至不惜损害中央政府的利益，不值得中央政府来维护。另外，这种“人的崛起”，不仅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还必须有大量的教育投资。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识字率明显比非工业化国家高。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也建立了庞大的义务教育制度。优越的教育体制使劳工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未来劳动力供应萎缩，更应该懂得“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加强对未来一代的培养，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和这种长远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教育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民工子弟在教育上仍然受到种种歧视。这无异于进一步摧毁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源。所以，中国不仅需要极大地提高教育投资，更需要教育公平。农村学生的人均教育行政经费一定要和城里的水平拉齐。每个公民，都能从小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的关心，这样长大后才会想着回报、想着为社会做贡献，才会成为更自觉、更有创造力的劳工和公民。

中国的经济战略与生活战略

那么，在“人重”之外又怎么能够获得“物轻”的优势呢？坦率地说，占据“物轻”的优势，需要天时地利。这两者恰恰都是中国不具备的。英美两国都有巨大的矿产资源。如18世纪英国的煤，19世纪中期美国发现的石油，为两国